

# 中国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建构 ——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与近代汉译西方文学(1896—1916)》

李 金



**【摘要】**自“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以来,世界文学理论一直笼罩在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之下,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创新实属不易且尤为珍贵。郝岚教授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与近代汉译西方文学(1896—1916)》一书,作为一部深入研究世界文学理论与中国近代汉译西方文学经验的理论专著,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弥补了西方世界文学理论框架的不足。同时,该书还以丰富的史料、精准的溯源与考据,为“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作者的论述兼具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的肌理,以“林纾小说”为例的跨学科研究为“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提供了生动阐释。由此可见,该书不仅为历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理论体系补充了中国经验,更是中国在世界文学理论谱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世界文学;林纾小说

世界文学理论自提出以来,便持续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西方学界逐渐形成以卡萨诺瓦、莫莱蒂和达姆罗什为代表的3种主流世界文学理论观点。而国内学界对“世界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阐发上,“从中国的立场和视角对‘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世界文学观进行修正甚至重构”(王宁,2024:8)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郝岚教授于2024年12月出版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与近代汉译西方文学(1896—1916)》一书,作为一部深入研究世界文学理论与中国近代汉译西方文学经验的理论专著,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为世界文学理论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而且为历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理论体系补充了中国经验,更成为中国在世界文学理论谱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郝岚教授以跨史学、文学和翻译3个学科的广博学术视野,展现了近代汉译西方文学的历史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全书一共6

章,不仅脉络清晰、逻辑严谨,理论建构与文本分析更是相得益彰。作者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全面深入地梳理了当代世界文学理论的3种主要学说,并指出了其明显的系统论倾向和存在问题,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的概念以及3个主要特征。随后,在第二章到第四章中,作者以文学史中的翻译现象和2位外国作家在中国的译介为例,具体阐释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的3个主要特征。在第二章中,作者以西方通俗作家在近代中国的风行现象为切入点,论述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的重要特征——翻译和经典的错位。这种错位,一方面体现在柯南·道尔、赖德·哈葛德、大仲马、儒勒·凡尔纳等西方通俗作家在近代中国的风行,另一方面表现为莎士比亚在中国“前经典化”进程中的通俗化倾向。在第三、四章中,作者通过考察柯南·道尔和赖德·哈葛德小说的汉译历史,发现二者最早译作均刊载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时务报》,进而指出:以林纾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域外作家或者翻译域外作品时,主要目的是通过通俗作品的“政治化接受”,实现对“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固有思想以至意识形态进行强化或攻击”(郝岚,2024:132),这正是以世界主义之名行民族主义之实的典型表现。随后的第五章中,作者回归文学文本,以“林译小说”的语言为例,指出林纾在翻译中使用的是一种介于“桐城派”古文和现代白话文之间的折中性“拟古文体”。这种文体在中国“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中推动了外国文学向中国文学中心的流动。在第六章中,作者从“杂小说”到现代小说分类演变说起,通过发掘中国现代文学审美功能的转换与“林译小说”社会功能的耦合关系,以及第一人称和日记体小说的出现对中国传统叙事学的革新,指出小说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逐步上升,这一现象进一步印证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的合理性。

相较于以往的世界文学专著,该书以中国近代汉译西方文学的特殊现象为切入点,提出民族文学在建构和面对世界文学的最初阶段所形成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这一创新理论。其既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又长于史学溯源和考据,同时兼具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的细致肌理,思想火花和批评洞见贯穿全书。

首先,“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的提出,弥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理论体系的不足。“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虽然可以追溯到维兰德(Christoph M. Wieland)和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Schlöder),但众所周知的是,19世纪“歌德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确立和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方维规,2017:13)。20世纪,西方理论主导着学术话语,从萨义德、斯皮瓦克到霍米·巴巴等后殖民理论家,虽不断挑战“世界文学”的西方标准,但来自第三世界的声音依然微弱。进入21世纪,卡萨诺瓦、莫莱蒂和达姆罗什先后提出3种较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学理论学说,新一轮世界文学理论探讨的主体仍然以西方为主。(郝岚,2024:11)尽管苏源熙(2015:16)指出“有多少种民族和本土的视角,就有多少种世界文学”,但是这些世界文学依然困囿于西方世界文学理论体系。郝岚教授在《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与近代汉译

西方文学(1896—1916)》一书中提出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是世界文学理论的有机补充,她以中国近代汉译西方文学的历史研究和翻译研究为依据,创造性地论证并支持了“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西方学者的世界文学理论体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为构建对象的,更适用于西方文学场域,对部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世界文学发展历史的阐释仍显牵强。因此,“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的出现是一种理论突破,既是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世界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也是对西方中心世界文学理论的重要补充。作者明确界定,“世界文学萌芽体系普遍存在于世界许多非西方主流民族文学试图融入文学‘现代化’的大合唱与构筑世界文学蓝图的开端”,这一界定表明其理论区别于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理论,聚焦非主流地区的“民族文学开始主动建构世界文学观念的最初时刻”,并进一步界定“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也存在不平等;有核心、半边缘、与边缘;体系有一条轴线,两端分别是‘自治’和政治、经济等因素主宰的‘他治’,萌芽体系中的文学在这两端徘徊,时而靠近‘自治’时而靠近‘他治’”(郝岚,2024:13—15)。作者借鉴了莫莱蒂的现代世界文学体系,并依据中国近代汉译西方文学的经验加入了自己的理论反思,最终生发出“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

其次,该书细致严谨的史料溯源与考据为“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近代汉译西方文学的研究,始于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阶段,对这一阶段翻译历史的考据和史料的溯源是开展文学研究和译介研究的基础。作者在考察 1896—1916 年被译介到中国的前 4 位外国作家的数据时,不仅参考了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写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而且与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第一卷(1897—1916)进行了数据交叉对比,最终得出结论。这样严谨和周密的数据考察和验证贯穿全书,例如,第三章对柯南·道尔小说汉译史的考察,除参考日本文献及中国大陆文献外,还纳入了中国台湾《推理》杂志中关于福尔摩斯的专栏内容;第四章对哈葛德汉译小说的分析,几乎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场,作者在论述中旁征博引,对林纾、鲁迅、茅盾和周作人等现代名家的著作如数家珍;同时,在对中国志怪小说和西方神怪小说的比较中,还回溯到中国汉代汉魏时期桓谭在《弘明集·新论·形神》和王充在《论衡》中对鬼的思索和争论,等等。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学“诗文”传统的分析,在第五章中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指出林纾在语言选择、文笔特点和审美趣味上都使汉译西方文学更加接近“中心文学”,并且追溯了近代语言的 2 个脉络与“由俗变雅”和“由雅变俗”的互渗,考察了士大夫阅读文言小说的真实心态与“崇古”“尚文”的评价标准,揭示了作为古文家的林纾所推崇的“古文家的义法”对其翻译小说的影响。作者在宏观上运用严谨和科学的方法对数据和材料进行梳理分析;在微观上又能明察秋毫之末,洞察文本细微之处的差异和变化;在观点论证上对古今中外的文献和史料信手拈来,真正体现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融汇古今和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

最后,该书兼具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的肌理,以“林纾小说”为例的跨学科研究为“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提供了生动阐释。作者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对柯南·道尔和哈葛德的翻译研究,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典型范例。作者遵循“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在进入具体翻译研究之前,首先提纲挈领地梳理由作家的家庭、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并且对作家及其文类在外国文学史上的定位进行介绍,然后梳理该作家的汉译状况和译本情况,最后开始对译本展开历时和共时的比较研究。在对柯南·道尔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对《时务报》第一册中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进行分析,指出《时务报》第六册中汉译《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因译者翻译的任意性忽略了侦探小说的固定程式,被当成了犯罪报告。同时,通过历时追溯《时务报》连续刊载的4个汉译本,指出4篇小说翻译原则的游移,进而对译者的唯一性产生疑问。在对哈葛德的研究中,作者指出,曾广铨翻译的《长生术》更具有随意性,他“以合并、省略甚至是篡改的方式翻译”,将英文小说中的古希腊铭文陶片拓片译为“贝叶书”,并删掉了原文图片,更将第三章3000字的文字和11张图片简化为几句话一笔带过(郝岚,2024:107—108)。这一历史时期,翻译策略和态度的随意性恰好契合外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中边缘位置的设定,并与“五四”后世界文学格局下外国文学翻译标准的提升形成鲜明对照。

在文学研究中,林纾的翻译小说触及了中国传统文类的边缘,推动了中西文类的交融和弥合,进而生成了独特的变异或者创新文类——林纾小说。阿拉斯泰尔·福勒(Alastair Fowler,2018:28)认为“一部作品与现存文类的联系有多种形式,或遵从,或变异,或创新,或彻底背道而驰,可无论关系如何,作品都会给文类带来新的状态”。作者指出,林纾在文类上的创新,与其在语言、文笔和审美范式的转变不可分割。语言上,林纾采用创新的“拟古文体”(Pseudo-classic style)来翻译世界文学,这种文体上承“桐城派古文”、下启现代白话文,是一种折中的语言;文笔上,林纾将古文家的质朴风流和翻译家的灵动自然相结合,形成具有古文余韵的译文,十分契合清末民初时人的阅读趣味,其译作更被尊为“国文”读本;审美上,“林纾的翻译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典范转移起到开创性作用,打破了中国文学长期的雅俗阻隔”(杨联芬,2002:1—28)。同时,作者认为“以《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迦茵小传》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上承晚清描写妓女生活的狭邪小说的流风,下启民初鸳鸯蝴蝶派之先河”(郝岚,2024:11),在阐述过程中涉及诸多文类的分析和比较,如哈葛德言情小说与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清末社会小说(鲁迅谓“谴责小说”)和言情小说(吴趼人谓“写情小说”)、中国志怪小说和西方神怪小说等。从文学的功能上看,作者发现林纾将通俗小说意识形态化,通过添加严肃的序跋引导读者阅读和思考,以期确立外国文学的典范地位。这类序跋既包含对女性的关注,如《蛇女士传》《迦茵小传》中对兴女学与限女权的倡导;也涵盖对国民性的反思,如《鲁滨孙漂流记·序》中对“中庸”的庸俗化与美德“让”的批判和抨击,以及对盗气、贼气、侠气

的倡导,然而这种“意欲在屈从西方的话语之后获得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郝岚,2024:137)的努力定是无疾而终。在这些序跋中,“林纾体现了一种现代的小说意识的觉醒,昭示着一种新的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文学模式在中国文坛诞生”(郝岚,2024:175)。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无疑意味着曾处于“边缘”的外国文学已经逐渐接近“中心文学”,“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也逐渐让位于“世界文学体系”。

任何理论创新必定植根于深厚的学理基础和知识沃土,“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的提出,是作者十载春秋精耕细作和知识沉淀的成果,是其海外学习的丰硕成果和对文学理论的深刻洞察。该理论不仅汲取了国内外学术资源的精髓,而且融合了作者个人的学术追求和深邃思考,既是对中国近代汉译西方文学现象的生动阐释,更是对世界文学发展趋势的敏锐捕捉和前瞻性判断。通过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管窥世界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展现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郝岚教授(2021:148)从“新世界文学”理论范式的提出,到本书中“世界文学萌芽体系”理论的构建,再到与金在涌教授对谈中提出的“新世界文学光谱”概念(郝岚,2024:1),无疑为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世界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 参考文献:

- 阿拉斯泰尔·福勒,2018. 文学的类别:文类和模态理论导论[M]. 杨建国,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方维规,2017. 何谓世界文学? [J]. 文艺研究(1):5-18.
- 郝岚,2021. “新世界文学”的范式特征及局限[J]. 文艺理论研究(6):148-157.
- 郝岚,2024. 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与近代汉译西方文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郝岚,金在涌,2025. 新世界文学光谱与韩江获奖的极化现象——郝岚与金在涌教授的对谈[J]. 外国语文,41(3):63-72.
- 苏源熙,2015.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M]. 任一鸣,陈琛,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宁,2024. 作为一种理论建构的世界文学[J]. 语言与文化论坛(2):3-12.
- 杨联芬,2002. 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1-28.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Budding System of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a: A Review of *The Budding System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Literature (1896-1916)***

LI Jin

**Abstract:** Since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was proposed, world literature theory has been overshadowed by Western-centrism, which mak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from non-Wester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valuable. Professor Hao Lan’s newly published book, *The Budding System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Literature (1896-1916)*, is a theoretical monograph that delves deeply into world literature theory and Chinese modern translation experience of Western literature. It creatively proposes the “The Budding System of World Literature” theory and supplements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Western world literatu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book also provides robust support for this theory through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meticulous textual research, and precise source tracing. The author’s analysis integrates the textures of both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literary research, with interdisciplinary case studies such as “Lin Shu’s novels” offering vivid illustrations of the “The Budding System of World Literature” theory. This work not only enriches the traditionally Western-centric world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perspectives but also mark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China to the genea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theory.

**Keywords:** The Budding System of World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Lin Shu’s novels

**作者简介:**

李金,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